

※採訪報導※

訪大陸《易》學專家——廖名春教授

何淑蘋 * 整理

時 間：2005 年 3 月 29 日晚上 9：00

地 點：臺北福華文教會館 8 樓 808 室

一、可否請您先談一談從小學到大學的求學歷程？

我初小讀湖南武岡洞庭小學，是母親任教的學校。高小讀縣裏的武師附小。高小讀不到一年，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，於是回到家鄉德江小學讀書，所以小學讀了三個地方。後來初中在村裏的高橋公社二中讀，高中讀的也是公社的學校（高橋公社中學），所以初中、高中讀的都算是很差的學校。而且那時候因為適逢文化大革命，沒有教材，所以學習來源都是油印的《人民日報》、《紅旗》雜誌、《解放軍報》社論。那時能看到的書很少，歷史沒學過，地理也沒學過，因為學校沒開這些課。畢竟是鄉裏公社學校，師資很有限。

高中畢業後，就在高橋公社德江大隊第十生產隊沙子坪老家勞動。這時已經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，我父親被解放，重新工作，擔任縣文教局副局長。圖書館那時候歸他們管，所以我跟圖書館人員比較熟，看了一些閒書，包括《論語譯注》¹、《中國古代散文選》等。因為我算是知識青年，一九七六年就被推薦到邵陽師專去

整理者按：本文由中研院文哲所林慶彰教授訪問，助理袁明燦先生協助錄音，再交予本人整理。為方便讀者閱覽，對廖教授提及的部分名詞酌加註釋。本文初稿完成後，承蒙廖教授撥冗審閱，謹申謝悃。

* 何淑蘋，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。

¹ 楊伯峻編著：《論語譯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8 年）。

讀中文科。當時是兩年制的，文革尚未結束，所以也還沒有教材，學生學最多的就是毛主席的詩詞。（林：像是〈沁園春〉之類的²。）那時我們學校裏還是有一些不錯的老師，特別是教古漢語、文選的一些老師很不錯，所以我覺得讀師專時在古漢語方面學得比較好。

一九七八年師專畢業後，我就去教中學，在武岡三中教書。由武岡而邵陽，一教就教了七年。教七年中學也是有不錯的地方，因為我原本在古漢語方面的程度比較好，加上教的又是語文科目，所以對古代作品可以讀得較熟。後來去考研究生，也是一個機緣。本來我最早準備要考的是南開的史學史，恰好那年那位老師不招生，第二年（1985）我就報考武漢大學。考的時候也沒什麼把握，大學裏的老師我一個都不認識，也沒去過武漢大學。在勾選學校的時候，我挑了四個學校，做了「取」與「不取」的八個鬮，信手一抓，抓住了「武大取」，後來就考進武漢大學古籍所。實際上那一年武漢大學招生名額比較多，有古籍整理研究生班，也有漢語史專業。當時我們年紀大的同學讀研究生班，年紀輕一點的就讀漢語史，因為研究生班讀兩年，而漢語史要讀三年。

二、在武漢大學古籍所和吉林大學古籍所碩、博士班 時，修過哪些老師的課，受哪些老師的影響較深？

在武漢大學讀書時，教我們的老師當中，年紀比較大的有周大璞先生³，是做訓詁學的學者；另一位是宗福邦先生⁴，是黃焯先生的研究生，最近編了一本書叫《故訓匯纂》⁵。

我們讀書的時候，周大璞先生年紀已經很大，學生也比較多，所以主要是宗福邦先生在管理我們。因為同班學生比較多，我們基本上是自學。同學中有年紀大的，年輕的就跟著年紀大的學習。我們古籍整理研究生班加上漢語史專業有十六個

² 即〈沁園春·雪〉，係毛澤東著名詞作。

³ 周大璞（1909-1993），字匪石，河南人。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。專研漢語史、訓詁學。曾任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、古籍所所長。編著有《訓詁學要略》、《訓詁學初稿》等。

⁴ 宗福邦（1936-），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。專研訓詁學、音韻學。現任武漢大學文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、教育部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。其以十八年時間與武漢大學教授合力完成之《故訓匯纂》，頗受學界重視。

⁵ 宗福邦、陳世鏡、蕭海波主編：《故訓匯纂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3年）。

同學，經常在一起討論。我覺得在武漢大學讀書時有兩個方面比較突出，第一個是課程比較少，現在讀研究生課程太多了，我們每個學期基本上只學一兩門課，或者學文字學，或者學訓詁學，或者學音韻學。課程雖然少，但是比較集中，我現在的小學工夫就是在讀武漢大學時培養出來的。宗福邦先生給我們上音韻學，周大璞先生給我們上漢語史和訓詁學，夏淥先生給我們上文字學⁶，廖延唐先生給我們上目錄學⁷，李德永先生給我們上《荀子》⁸。我們每學期上一兩門課程，學習的情形還算不錯。

當時唐長孺先生正在整理吐魯番文書⁹，我們有一個同學本科是歷史系的，對唐先生他們的東西比較熟悉，就拿了吐魯番文書來。我一看很感興趣，後來碩士論文做的就是吐魯番文書，題目叫作《吐魯番出土文書語言管窺》。等兩年時間到，要畢業時，我的論文已經做出來，就先回到湖南。一九八七年七月至一九八九年九月間，我在湖南省委黨校理論研究室工作，具體項目是辦一份叫《湖湘論壇》的刊物，擔任副主編。工作一年後，再回到學校做論文答辯。當時念漢語史的同學也準備畢業，所以我是讀兩年書，但是答辯是跟三年級同學一起參加的。

我大學念了兩年，研究生也念了兩年，所以總共是念了四年書。這四年間主要是學習古籍整理、目錄版本、古代漢語，還沒有做過什麼具體的研究。研究生畢業後是在黨校工作。我的專業不太合適在黨校工作，因為我主要做古典方面研究，而黨校需要的是現代政治、經濟方面的。我看到這個情形，就離開黨校，去吉林大學念博士生。之所以會想去吉林大學，是因為當時讀了金景芳先生的《古史論集》¹⁰，

⁶ 夏淥(1923-2006)，本名王先智，杭州人。專研古文字學。武漢大學中文系教授。著有《評康殷文字學》。

⁷ 廖延唐，專研目錄版本學。武漢大學圖書館學系教授。著有《圖書館古籍整理》（與曹之合編著）等。

⁸ 李德永(1924-)，湖北漢陽人。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，專研中國哲學史。曾任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，已退休，現任湖北省哲學史學會理事顧問。著有《荀子——西元前三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》等。

⁹ 唐長孺(1911-1994)，江蘇吳縣人。上海大同大學文科畢業。曾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、主任。著有《魏晉南北朝史論叢》、《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》、《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》、《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》等。

¹⁰ 金景芳(1902-2001)，遼寧義縣人。吉林大學古籍所教授，專研《易》學、文獻學、先秦史、法制史。著有《周易講座》（呂紹綱整理）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1987年）、《周易全解》（與呂紹綱合著）、《周易繫辭傳新編詳解》、《古史論集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1年）等。

非常欣賞金先生的學問。我有位同學叫康學偉，跟我同一屆，我向他介紹金先生的書，建議他先去讀，所以他比我早一年去吉林大學念博士，他去了之後第二年(1989)我才去。

金景芳先生是金毓黼先生的學生¹¹。這種學生關係，不是我們一般高校畢業的那種。金毓黼先生擔任遼寧省教育廳廳長的時候，曾在全省招聘教育科長，金景芳先生考取了第一名，就到金毓黼先生那裏去工作，後來長期擔任金毓黼先生的秘書，所以金景芳先生可以算是金毓黼先生教出來的。金毓黼先生就是金安平教授的祖父¹²，他應該算是當時東北第一號學者，影響力很大。長期跟隨他做事，儘管在名義上不算讀書，但學問也鍛鍊出來了。當時張學良興辦了東北大學、東北中學、東北小學，都親自兼任校長。金景芳老師在關內流浪時，是東北中學的教務長。那時東北軍和政府之間可能有一些矛盾，所以東北中學被迫解散，於是金老師就轉到了復性書院。

金老師在復性書院讀書時，熊十力實際上還沒去¹³，帶他們的人是馬一浮先生¹⁴，所以金老師是復性書院第一期學生。金老師後來寫了一本書叫《易通》，他的同鄉高亨對這本書評價較高¹⁵，因此獲得中央政府的一個獎項。政府那時有一個規定，

¹¹ 金毓黼(1887-1962)，原名毓璽，一名玉甫，字謹庵，又字靜庵，別號千華山民，遼寧人。受教於章太炎、梁啟超，為近代著名歷史學家，尤長於東北地方史。曾任遼寧省政府秘書長、教育廳廳長等職，並任教於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、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，後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(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)研究員。著有《中國史學史》、《東北通史》等。

¹² 金安平(1950-)，出生於臺灣，一九六二年舉家移民至美國維吉尼亞州。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。現任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。祖父金毓黼，近代著名歷史學家；父金長銘，來臺後任教於成功大學建築系；夫婿史景遷(Jonathan D. Spence)，著名中國近代史學者，現為耶魯大學中國近現代史講座教授。著有 *The Chinese Century: A Photographic Histo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* (《中國近百年攝影史》，與史景遷合著)、*Four Sisters of Hofei: A History* (《合肥四姐妹》) 等。

¹³ 熊十力(1885-1968)，原名升恒，字子貞，湖北黃崗人，當代著名新儒學思想家。著有《新唯識論》、《讀經要義》等，其著作後彙編為《熊十力全集》(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1年)。

¹⁴ 馬一浮(1883-1967)，名浮，字一浮，號湛翁，浙江紹興人，當代著名新儒學思想家。著有《復性書院講錄》等，其著作後彙編為《馬一浮集》(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、浙江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)。

¹⁵ 高亨(1890-1986)，字晉生，吉林雙陽人，當代著名《易》學家。山東大學教授。著有《周易古經今注》、《周易大傳今注》等，其著作後彙編為《高亨著作集林》(北京：清華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)。

如果得了這個獎就可以直升教授¹⁶。金老師就憑《易通》這本書，連副教授都沒幹過，就當上教授了。金老師四九年以後主要在吉林大學（當時稱為「東北人民大學」）教書，五十年代初寫了幾篇研究《周易》的文章，學校請馮友蘭先生審查¹⁷，他不太同意金老師的看法，但匡亞明校長還是讓金老師的文章在學報上發表了¹⁸。我們到吉林大學讀博士時，金老師的《周易講座》一書剛出版，金老師跟我們講《周易》就講得比較多。但當時金老師年紀已經很大，也不上課，我們就經常到他家裏去聊聊天，講講話。實際給我們上課的人是呂紹綱先生¹⁹，由呂先生開設《周易》課程。我們入學的第一門課是《周易》，所以這方面工夫下得就比較多一些。

做博士論文的時候，金老師有兩個題目，一個是「孟子」，一個是「荀子」。金老師原屬意我做《孟子》，結果另外一個同學想做《孟子》，所以我就改做《荀子》。我在武漢大學念碩士時，跟李德永先生做過《荀子》，有一定的基礎，所以博士論文就做《荀子新探》²⁰。這本書在臺灣的文津出版社出版，有些學者經常會提到，包括裘錫圭先生、陳來先生也都提過我的這本書²¹。我做出土材料應該是比較晚的。

¹⁶ 當時教育部舉辦「著作發明及美術獎勵」，金景芳先生以《易通》一書，由金毓黻、高亨兩位教授推薦，榮獲三等獎。

¹⁷ 馮友蘭(1895-1990)，字芝生，河南唐河人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。當代著名新儒學思想家。曾任廣州中山大學、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等校教授，中央研究院院士。著有「三史」（即《中國哲學史》、《中國哲學簡史》、《中國哲學史新編》）和「六書」（即《新理學》、《新事論》、《新世訓》、《新原人》、《新原道》、《新知言》）等，其著作後彙編為《三松堂全集》（鄭州：河南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）。

¹⁸ 匡亞明(1906-1996)，江蘇丹陽人。中共建國後，曾任東北人民大學、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，江蘇省五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，及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、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。著有《孔子評傳》等。

¹⁹ 呂紹綱(1933-)，安徽旌德人。著名《易》學家，吉林大學教授。著有《周易闡微》、《周易的哲學精神——呂紹綱易學文選》、《庚辰存稿》等。

²⁰ 廖名春：《荀子新探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4年）。廖先生於1992年6月以此書獲得吉林大學史學博士學位。

²¹ 裘錫圭(1935-)，浙江寧波人。專研古文字學、古典文獻學。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，現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。著有《文字學概要》、《古文字論集》、《古代文史研究新探》、《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》等。陳來(1952-)，浙江溫州人。北京大學哲學博士。專研中國哲學史、儒家哲學、近現代哲學。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。著有《朱熹哲學研究》、《宋明理學》、《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》等。

三、您可說是《易》學的專家，《易》學著作甚多，請問有哪些創見？

我的博士論文答辯完後，學校裏沒有什麼事，剛好當時湖南準備出《馬王堆漢墓文物》這本書²²，其中發表了一部分〈繫辭〉的釋文和照片，我有朋友在出版社，就叫我看一下。那時我正準備離開吉林大學，對這些資料很感興趣，看到原來做的釋文錯誤很多，我就寫了一篇帛書〈繫辭〉釋文校釋。我畢業時原本要去中山大學歷史系，張榮芳先生寫信給金老，非常歡迎我去。但是吉林大學原來的老校長匡亞明先生給我們金老寫了一封信，希望我去他的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，我就準備過去。可是呂紹綱先生告訴我，在匡老那邊做事不是很容易，他對人要求很嚴格，跟我的個性不一定合適，又聽錢遜說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要人²³，建議我去清華大學。當時金老要去香山參加古籍整理規劃會，我陪金老去開會，順便到清華大學，跟人事部門談了五分鐘就談妥，結果去了清華大學。

我在念博士的時候還寫了一部書叫《周易研究史》²⁴，是跟幾位同學合寫的。因為金老給我們講《周易》，使我們對《周易》很感興趣，就把歷史上研究《周易》的情況大致梳理了一下，於是寫出了這部通史性的書。那時朱伯崑先生的《易學哲學史》已出版第一、二冊²⁵，只寫到宋代，沒有寫到當代，而我們這本書一直寫到八九年。我們跟朱先生的書比較起來：首先，我們是通史性的書，和朱先生的不同；其次，我們對《周易》的看法，跟朱先生也有不同。因為我們是跟著老師，抱持比較傳統的觀念，朱先生則跟馮友蘭先生一樣，是二十世紀以來思想比較先進

²² 傅舉有、陳松長：《馬王堆漢墓文物》（長沙：湖南出版社，1992年）。

²³ 錢遜（1933-），江蘇無錫人。著名國學家錢穆之子。清華大學、中國人民大學畢業，曾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，現為清華大學教授。專研先秦儒學。著有《論語淺解》、《先秦儒學》、《中國古代人生哲學》等。

²⁴ 廖名春、康學偉、梁韋弦：《周易研究史》（長沙：湖南出版社，1991年）。

²⁵ 朱伯崑（1923-），河北省寧河縣人。清華大學哲學系畢業。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、東方國際易學研究院院長兼學術委員會主任、中國易學與科學研究會理事長。著有《易學哲學史》、《易學漫步》、《燕園耕耘錄：朱伯崑學術論集》等，並主編有《國際易學研究》、《周易知識通覽》。

的學者，強調經傳分家、以經解經之類，我們是比較傳統的。這本書是我們三個人合寫，實際上我寫先秦部分，一個同學寫漢唐部分，另一個同學寫宋元部分，我又寫了明清到一九八九年，所以我一共寫了兩個部分。

我寫這本《周易》研究史，當然也不能說想法已經很成熟，但是有一個好處，就是把歷代研究《易》的情況看了一下，把這些線索做了梳理，對我自己研究《周易》很有幫助。現在寫《易》學史的人很多，他們在寫完後都不知道自己還要做什么，但是我寫完《易》學史之後，就知道自己要做哪些研究，所以後來我就研究帛書《易傳》。

我去清華大學，一報到完，就馬上到湖南省博物館去參加馬王堆漢墓國際學術討論會，認識了池田知久先生²⁶。池田先生告訴我說他已經拿到帛書《易傳》的照片了。當時我就想，他能夠拿到照片，為什麼我不去想辦法拿到？於是我就跟陳松長說²⁷。陳松長的老師周秉鈞先生和我老師周大璞先生是武漢大學的同學²⁸，因此學生之間的關係還不錯，陳松長就把《易傳》那幾篇的照片拿給我。我根據這批照片做釋文，當時也得到了陳鼓應先生的支持²⁹。完成釋文的那天晚上，我和陳鼓應先生、王博一起到李學勤先生家裏³⁰，把釋文交給李先生，請他幫忙看看。李先生也做了點修改，後來就將它發表出來³¹。陳鼓應先生認為不應該只發表釋文，應該

²⁶ 池田知久(1942-)，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中國哲學博士。專研中國思想史，現任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文學部教授、東京大學名譽教授。著有《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》、《老莊思想》等。

²⁷ 陳松長(1957-)，湖南新化人。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，現任湖南省博物館副館長、研究員，四川師範大學、湖南大學兼任教授。著有《帛書史話》、《馬王堆帛書刑德研究論稿》、《馬王堆帛書竹簡文字編》等。

²⁸ 周秉鈞(1916-1993)，專研古漢語、《尚書》學，曾任湖南師範大學教授。編著有《古漢語綱要》、《尚書易解》、《白話尚書》等。

²⁹ 陳鼓應(1935-)，福建長汀人。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，專研中國哲學史、道家。曾任臺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、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研究員、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，現任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。著有《老莊新論》、《老子今註今譯》、《老子註譯及評介》、《莊子今註今譯》、《黃帝四經今註今譯》、《易傳與道家思想》等。

³⁰ 王博(1967-)，北京大學哲學博士。專研中國哲學史、道家哲學。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。著有《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》、《易傳通論》、《莊子哲學》等。

³¹ 陳松長、廖名春：〈帛書〈二三子問〉、〈易之義〉、〈要〉釋文〉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3輯(1993年8月)，頁424-435。

對這批帛書材料做點介紹，於是我就對〈二三子〉、〈要〉篇等都寫了說明的文章。陳鼓應先生催稿催得很急，我一篇接一篇寫，陸續完成四、五篇，後來發表在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三輯上³²。另外還有〈繆和〉和〈昭力〉沒發表，朱伯崑先生對這兩篇比較感興趣，就叫我去做。我們找了湖南省博物館的館長熊傳薪先生³³，他的態度很積極，說我們研究越多對博物館越好，所以我就見到並且拍攝了全部帛書《易傳》的照片。我們把釋文發表在朱伯崑先生主辦的《國際易學研究》創刊號上³⁴。這個材料發表後，在學界有很大的影響。帛書〈繫辭〉和今本〈繫辭〉比較起來，少了一些，陳鼓應先生和王葆玟他們就認為這些是道家的東西³⁵，把儒家的東西去掉了，當時對學界造成很大的影響。我在炎黃文化館的會議上力辯其非，發言完後，陳來先生覺得我講得很有道理，就邀我寫一篇文章跟陳鼓應先生他們做討論。所以我就寫了一篇文章，說帛書〈繫辭〉應該不是道家的東西，跟陳鼓應先生他們發生論戰。

我做帛書《易傳》的成績，第一個是把釋文做出來，第二個是把帛書〈衷〉篇補齊。〈衷〉原來叫〈易之義〉，可是它的標題叫什麼？大家並不清楚。結果我在湖南博物館的倉庫把碎片翻出來，把標題找了出來，而且字數也找出來，約有兩千，把這塊補了出來³⁶。因為找到碎片，我們還補了〈要〉篇前面的部分，它跟今本〈繫辭〉有些地方不同，就根據這個補了出來。另外，〈要〉篇裏面有很重要的記載，是關於孔子與他的學生子貢討論《周易》的情況。裏面講孔子晚而好《易》，「居則在席，行則在囊」。孔子晚年非常喜歡《周易》，在家就放席上，

³² 文刊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3輯（1993年8月），包括：〈帛書〈二三子問〉簡說〉（頁190-195）、〈帛書〈易之義〉簡說〉（頁196-201）、〈帛書〈要〉簡說〉（頁202-206）、〈帛書〈繆和〉、〈昭力〉簡說〉（頁107-215）。

³³ 熊傳薪（1940-），湖南人。專研考古文物，畢業於四川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，曾任湖南省博物館研究員、館長，現任湖南省收藏協會會長。著有《楚國·楚人·楚文化》等。

³⁴ 文刊《國際易學研究》第1輯（1995年1月），包括：〈帛書〈二三子問〉釋文〉（頁7-12）、〈帛書〈繫辭〉釋文〉（頁13-19）、〈帛書〈易之義〉釋文〉（頁20-25）、〈帛書〈要〉釋文〉（頁26-29）、〈帛書〈繆和〉釋文〉（頁30-37）、〈帛書〈昭力〉釋文〉（頁38-39）。

³⁵ 王葆玟（1946-），北京人。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，現任日本東京大學教授。著有《西漢經學源流》、《今古文經學新論》、《老莊學新探》、《玄學通論》、《正始玄學》等。

³⁶ 見廖名春：〈試論帛書〈衷〉的篇名和字數〉，《周易研究》，2002年第5期，頁3-9。

出門就把《周易》放口袋裏。子貢就對孔子有批評，他說老師以前說《周易》是卜筮之書，要他們少讀，自己現在卻對《周易》這麼入迷。孔子因而有解釋，說《周易》跟筮巫是同途而殊歸，都是學《易》，旨向卻不同，他是求其「德義」。但是從整個〈要〉篇來看，子貢並沒有被孔子說服，兩個人反覆地在討論。

我從〈要〉篇中得到一個啟示，覺得孔子的《易》學觀前後有很大的變化。在晚年以前，孔子對《周易》是不提倡的，他的這種思想對子貢這些學生有很大的影響；但是到了晚年，孔子改變了，變得很喜歡《周易》。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，我做過分析，認為是有原因的。因為《左傳》裏講韓宣子到魯國來，看到《魯春秋》和《易象》兩本書，因而講到「周公之德」，講到「周之所以為王」³⁷。我們知道《春秋》有「不修春秋」和「魯春秋」，但孔子看到《魯春秋》之後，加了一些東西，所以《春秋》裏面有孔子的東西。我想孔子《易》學觀的改變，跟《易象》這本書有關係。他本來是不重視《周易》的，但是讀了《易象》這些東西後，就改變了對《周易》的看法。根據《左傳》裏面的記載來看，這些跟周公是有關係的。因為他一講到這個書，就提到「周公之德」。我進而分析，想要影響孔子的思想，一般人應該是改變不了的，可是如果說這是周公的東西，那麼孔子的《易》學觀是有改變的可能，因為孔子對周公是很信服的。所以我就做了這麼一個分析³⁸。

這篇文章出來後應該還是有些影響，包括劉述先先生寫文章也比較贊成我的看法³⁹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樣徹底解決了一個問題。我們以前研究孔子，往往將孔子思想看作一成不變的，但《周易》這件事實際上說明了孔子思想是有改變的，這樣來看孔子很多話的矛盾就可以獲得解決。比如講孔子思想的時候，有些人講是以「仁」為中心，有些人則說是以「禮」為中心。特別是講孔子對於天道的看法，對於性的看法，有些人說是「罕言」，實際上孔子講天的地方也有很多。為什麼造成這個現象呢？我覺得是跟孔子晚年思想的變化有關係。因為早年孔子對政治比較熱情，到處周遊列國從政，到了晚年思想出現了較大的變化，趨於成熟。從現在的出

³⁷ 此事載於《左傳·昭公二年》：「周禮盡在魯矣，吾乃今知周公之德，與周之所以王矣。」

³⁸ 廖名春：〈試論孔子易學觀的轉變〉，《孔子研究》，1995年第4期，頁25-29轉頁59。

³⁹ 劉述先(1934-)，江西吉安人。臺灣大學哲學系碩士、美國南伊利諾大學哲學博士，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講座。著有《中國哲學與現代化》、《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》、《黃宗羲心學的定位》等。

土材料像郭店簡、上海簡來看，孔子晚年的東西特別多。而且同樣的爭議不但發生在《周易》上面，對祭祀也是。你看在〈要〉篇、〈魯邦大旱〉和其他文獻中，孔子老是和子貢發生爭論。所以我寫〈魯邦大旱〉的時候，發現孔子並不反對發生大旱時祭祀鬼神，他是主張利用，但也是跟子貢講不清楚，子貢不能理解，就發生了爭議。這跟他對《周易》的態度完全是一致的，所以我覺得孔子晚年思想可能有很大的變化，包括《易傳》這些東西，可能就是晚年的東西。

我們講《六經》的時候，實際上有兩種說法。第一種說法是講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把《詩》、《書》放在前面。按周予同所說，這是所謂今文家的說法，而古文家則是把《周易》擺在第一。我想恐怕不完全是這個原因，我覺得這應該跟孔子思想的變化有關。孔子早年對《周易》不重視，所以對《周易》一書很少研究，因此跟《春秋》排在最後，這是很自然的現象。到了孔子晚年，我們讀帛書〈要〉篇時就注意到，他對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都認為不只百篇，分量太多了，了解起來、讀起來有困難，他就要求大家要讀《周易》，認為讀了《周易》後實際上就可以取代其他的，所以對《周易》的看法就比別的經要突出。反映在古文家上，就把《周易》排在第一，把它的地位提高上來。所以我覺得《六經》的次序，實際上跟孔子思想前後的變化有關。以前我們講今文經和古文經，老是在講文字的不同，但是這樣不能回答一個問題，就是它們文字上的不同，不能牽扯到《六經》以哪一經為主的看法，因為這是涉及思想的問題。我覺得孔子思想的變化，由於孔子晚年的學生接受了孔子晚年的思想，特別突出了《周易》，而孔子早期的學生，因為孔子對《周易》有批評，所以大家自然對《周易》就不太討論。由這樣的方式來解釋今古文經的起源，從邏輯上來說應該要好一些。我後來就寫了一篇文章專門討論《六經》次序問題，批評了周予同的說法⁴⁰。

對於《周易》研究，我以前一直是做帛書《易傳》，經文一直沒有做，因為《周易》的經文有很多問題搞不懂，到了最近一兩年才開始做經文的研究，所以我大概做了十多年《易傳》的研究。我們的老師以前都主張要由傳入經，要從《易傳》去理解《易經》，當然，這跟學界一般的講法不同。學界一般認為經是經、傳是傳，把經、傳分開。但是我覺得由傳解經有它好的地方，因為做傳的人畢竟比我

⁴⁰ 廖名春：〈「六經」次序探源〉，《歷史研究》，2002年第2期，頁32-41。

們後來的人在時間上更接近作《易》者。這幾年下來，我覺得這個說法還是很有道理的。特別是前年發生 SARS 疫情時，在家裏也沒什麼事，就關起門來寫文章。我寫了一篇文章，是在講反對為義，發揮了一下孔穎達他們的說法。我覺得《周易》六十四卦，如果按照〈序卦傳〉的說法，是建立一個歷史序列。它從〈乾〉、〈坤〉開始講父母，接著〈屯〉、〈蒙〉是出生，然後再一步步地講下去，講到後面就講不下去了，有它的困難。但是〈雜卦傳〉用兩兩並舉的辦法，都是一對一對的講《周易》，用對舉現義的辦法來講《周易》。

我覺得〈說卦傳〉講得非常有意思。我後來讀屈萬里先生的書⁴¹，看到屈先生在講反對關係，其實是非常強烈地強調反對為義的看法。不過屈先生所講的反對，並不認為《周易》全部都具有反對關係，只認為有一部分是。我就把這個理論發揮了一下，認為《周易》的三十二對卦都是反對，也就是說它的卦象是反對，是非復即變、兩兩相對，是顛倒的關係，都是一對一對的。其卦形特點反映在卦義上，就是反對為義。比如〈乾〉、〈坤〉，它們卦形是相對的，卦義也是相對的。又好像〈屯〉、〈蒙〉也是兩兩一組，把〈屯〉卦倒過來就是〈蒙〉卦，它們的卦義也相反，〈屯〉是草木出生往上面長，〈蒙〉是蔽，把它蓋住了，不讓它生長，剛好相反。〈需〉是畏縮不前，是等待，這是古義。〈訟〉是爭訟。一個是畏縮不前，一個是爭訟，剛好卦形顛倒，卦義也是反對的關係。〈師〉跟〈比〉也是如此。〈師〉把它倒過來就是〈比〉，但是實際上〈師〉是講打仗，〈比〉是講團結、親比，關係也是相反的。〈小畜〉跟〈履〉也是如此。〈履〉把它倒過來就是〈小畜〉。履就是行，就是走；小畜就是止，密雲不雨就是止，就是不動。

我們對《周易》三十二對卦做了分析的結果，知道它每一對的卦形不但是非復即變，它的卦義也是相反的，所以我們就發現《周易》的對子是它最基本的一個現象。我們講《周易》是陰陽哲學，實際上它就是一種對子的哲學，這些對子是不能夠拆開的。我們掌握了這個原理之後，實際上就可以把《周易》的很多地方解開。比如說我們知道〈謙〉的卦義是謙虛，但是古人講〈豫〉是樂，所以我們發現古人

⁴¹ 屈萬里 (1907-1979)，字翼鵬，山東魚臺人。中央研究院院士，專研經學、圖書目錄學。曾任職於山東省立圖書館、臺灣中央圖書館（今國家圖書館），並擔任臺灣大學、東吳大學等校教授，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、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客座教授。其著作後彙編為《屈萬里先生全集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5年）。

的說法是不對的，〈豫〉的卦義應該是自大，與〈謙〉剛好是反對。為什麼呢？因為《說文解字》解釋豫是「象之大者」⁴²，就是講大，這是第一點。第二點是古人講豫的時候說「豫賈」，包括《荀子》、《史記》這些古書經常都有提到，意思就是抬高物價。這個東西本來是十塊錢，我算他一百塊錢，就是豫賈，所以豫有大的意思在內。在秦簡《歸藏》中，豫字不寫作豫，它寫作「介」，「介」也是大的意思。所以我們就知道，實際上〈謙〉是講謙虛，〈豫〉的本義則是自大，就是我們講的驕傲自大⁴³。

又比如〈頤〉和〈大過〉是一對卦。我們知道頤和園，頤就是頤養。但是我們對於大過，以前的人說大為過甚，實際上這樣講是不對的，大過的意思是死，剛好跟頤相反。頤是活，大過是死。為什麼呢？以前皇帝死了叫大行皇帝，大行就是大過，過就是行。特別是〈繫辭傳〉解釋〈大過〉時，說古人看到這個卦就發現了棺槨，所以〈大過〉就是講死。我們掌握了反對為義的辦法，就可以把《周易》中一些我們不知道的卦義推測出來，對確定卦義是有好處的。

另外，對我們認識《易傳》也是有好處的。我們以前讀〈序卦傳〉不知道《周易》的基本結構是一種對子，所以往往從〈坤〉講到〈屯〉，從〈蒙〉講到〈需〉，實際上不能這麼講，因為《周易》是一對一對的。《周易》的對子與對子間有什麼關係，現在還不太清楚，但哪個和哪個一對則是非常清楚的。所以用這種理論來看，我們覺得在《易傳》裏面，其實〈雜卦傳〉解《易》解得很好，但〈說卦傳〉和〈序卦傳〉就有問題。〈序卦傳〉我們知道它實際上走的是《易》外別傳的路子，是後人的一種發揮。在這兩天演講時，我就提到〈說卦傳〉解釋《周易》實際上是分成兩個部分，第一段、第二段是講六畫卦，那是講《周易》，下面的九段都是講八卦，但是講這些八卦，實際上前人是有說法的。前人講到「天地定位」，按照邵雍的說法，談的是先天卦位；講到「帝出乎震」，談的是後天八卦、文王八卦。前人從干寶以來，認為天地定位這個東西是《歸藏易》，認為帝出乎震那個東西是《連山易》，他們有這個說法。它們到底是不是《連山》、是不是《歸

⁴² [漢]許慎：《說文解字》（臺北：黎明文化事業公司，1994年），頁464上曰：「豫，象之大者。賈侍中說不害於物。从象，予聲。」

⁴³ 以上可參廖先生所撰〈楚簡《周易·豫》卦再釋〉一文，收入《出土文獻研究》第6輯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）。

藏》，這個我們暫時不予討論，但是證明這些東西不是《周易》，我覺得這一點更重要。

為什麼能夠這麼說呢？因為《周易》是以對子為重點的，所以在《周易》裏面，〈乾〉、〈坤〉為一對，〈坎〉、〈離〉為一對，這些是沒問題的，都是一對的。然後在六十四卦裏面，〈震〉跟〈艮〉是一對，〈巽〉跟〈兌〉是一對。但是到了〈說卦傳〉，就把對子拆開了，把〈震〉配了〈巽〉，〈艮〉配了〈兌〉。這個配法按照卦畫來看，次序配得很好，是按父母跟六子卦的次序，長男、中男、少男這樣一路排下來，很有次序，但是卦義上來看卻講不通。為什麼從卦義上來講是不通的呢？我們知道〈乾〉跟〈坤〉它的卦形是相對的，它的卦義也是相對為義的，〈坎〉跟〈離〉也是如此，〈震〉跟〈艮〉也是如此。我們把〈震〉顛倒過來就是〈艮〉。〈震〉是動，〈艮〉是止，它的卦義是相反的。我們知道〈巽〉是入，〈兌〉是現，我們現在還講兌現，一個是入義，一個是現義，剛好是相反的。但是〈說卦傳〉把這個配對打破，把〈震〉配〈巽〉，這樣一來卦義就不相配了，因為一個是動，一個是入，沒有反對關係。同樣〈兌〉跟〈艮〉也沒有反對關係。它就不懂配對的原理，按父母和六子卦的關係重新組合，所以不管是天地定位（就是邵雍講的先天八卦）也好，還是帝出乎震的後天八卦也好，它們都是按乾坤六子，就是父、母、長、中、少這個次序排下來，把《周易》原來的配對都打亂了。實際上不管是先天卦位也好，還是後天卦位也好，它把《周易》原來配對的規律都打亂了，所以這些東西嚴格來說都不屬於《周易》系統⁴⁴。總之，我們掌握了反對為義的這個特點，對《易傳》來說，講《周易》的高低一眼就可以看穿。因為《周易》是陰陽哲學，陰陽哲學最強調的就是對子。

所以《周易》哪個跟哪個一對，這個是非常清楚的。〈乾〉、〈坤〉在前面，〈既濟〉、〈未濟〉在後面，這個我們也是知道的。哪個跟哪個是一對，我們應該把它講清楚，這個我們是做得到的。所以關於《周易》，我就寫了這篇文章。後來根據這個理論，對於《周易》六十四卦做了一些新的解釋，寫成《周易經傳十五講》這本書⁴⁵。我現在準備按照這個想法再做一個《周易》的新注。因為每一經都

⁴⁴ 以上可參廖名春：〈八卦次序試論〉一文，收入《遯亨集——呂紹綱教授古稀紀念文集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）。

⁴⁵ 廖名春：《周易經傳十五講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）。

有它的特點，如果不掌握它的特點去研究，那麼做的都還是外圍。《周易》就是有這個特點。

很多人說帛書《周易》比今本《周易》還要早，我說是不可能的，為什麼不可能呢？因為他們往往只注意到卦畫的排列，而忽視了卦德和卦義。因為《周易》的〈乾〉、〈坤〉，〈既濟〉、〈未濟〉，〈損〉、〈益〉，〈泰〉、〈否〉，這些都是配好的。到了帛書之後，〈乾〉、〈坤〉不在一起，〈既濟〉、〈未濟〉不在一起，〈坎〉、〈離〉不在一起，〈損〉、〈益〉不在一起，〈泰〉、〈否〉不在一起，你能夠說它是原始的嗎？〈泰〉、〈否〉在一起，〈既濟〉、〈未濟〉在一起，肯定才是原始的。他們就不懂這個道理。這是由卦義決定的。

我覺得一直到這幾年認識到了反對為義的道理後，我們關於《周易》的看法才算成熟，以前都不算成熟。所以我在清華講了十多年《周易》，很少講經，這兩年才開始講得比較多一點。我現在有個計畫，準備給《周易》做一個新注，打算明年加緊做，包括夏含夷也催我⁴⁶，趕快把新注做出來。現在條件比較充足了，比如帛書也有了，阜陽漢簡《周易》也有了，戰國楚簡《周易》也有了，《歸藏》也出來了，這些都是前人沒看到的東西。根據這些，再加上我自己理論上也提昇了，這樣做注肯定會有意義些。

關於《周易》，基本上我就有這些想法。與我談得比較多的，可能是呂紹綱先生。呂先生跟我們金老師兩人曾經合寫了《周易全解》⁴⁷，以前是由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，這次做了修改後，在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出版。呂先生修改的原因，第一是講經的思想有改變，有發展；第二是看到我的書之後，覺得有些地方要好好修改一下。

（林：不好意思，我想插問一下，年輕人如果想讀簡帛的話，應該要具備哪些條件？）年輕人讀簡帛的話，我對我的學生，是要求他們簡帛和文獻要熟悉一種。不要所有的文獻都熟，但是一定要熟一種文獻，熟一種簡帛材料，兩樣一邊熟一

⁴⁶ 夏含夷 (Edward Shaughnessy)，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教授。著有《溫故知新錄：商周文化史管見》、《孔子之前：中國經典形成研究》(*Before Confucius: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*)、《古史異觀》等。

⁴⁷ 金景芳、呂紹綱：《周易全解》（長春：吉林大學出版社，1991年初版；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年修定本）。

種。當然做簡帛的話，小學要好。小學就我們而言，是要對戰國文字熟悉。其實以前在戰國文字方面的條件比較不具備，現在條件較好，因為戰國文字這幾年有很大的發展。（林：那麼要如何入門？）入門的話，可以讀何琳儀⁴⁸寫的《戰國古文字典》⁴⁹。再一個是《漢語大字典》⁵⁰，也是非常有幫助的。什麼字可以先去翻字典，翻完後再來說，這種方法雖然比較笨，但是比較可靠。另外，在傳統文獻方面，一個是經典文獻要熟一種，再來可能要讀讀《讀書雜誌》這些書⁵¹，要懂古音。清人學術成就最好的應該是在古音學上，乾嘉學者以聲音通訓詁，做得最好。文字方面，從王國維之後，有相當大的發展⁵²，但是古音學方面還是用清人的那些東西，沒有很大的發展，所以我們應該要讀讀王念孫的《讀書雜誌》這類的書⁵³。如果是戰國古文字通假方面的話，高亨有《古今通假會典》⁵⁴。要勤用這些書。總之就是哪個東西不懂，一定要去翻字典，不要挖空心思去想，光是想是不行的，思而不學則殆。如果想知道這個字說什麼，就去翻《漢語大字典》；如果想知道它的古文字，就去翻《戰國古文字典》。翻過這些書後，十之七八的問題基本上也就解決了。

⁴⁸ 何琳儀(1943-2007)，吉林大學歷史系碩士。專研古文字學。現任安徽大學中文系教授、中國古文字學會副秘書長，中國錢幣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。著有《戰國文字通論》、《古幣叢考》、《戰國古文字典》等。

⁴⁹ 何琳儀：《戰國古文字典：戰國古文聲系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）。

⁵⁰ 漢語大字典編纂委員會編：《漢語大字典》（武漢：湖北辭書出版社；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86-1990年），共8冊。

⁵¹ 《讀書雜誌》，清王念孫所著，內容係以札記形式，對史、子、集內容作訓詁解釋。

⁵² 王國維(1877-1927)，初名國楨，字靜安（庵），號觀堂，浙江海寧縣人。曾任滿清學部總務司行走，兼京師大學堂農科教習。青年時從事文學研究，辛亥革命後隨羅振玉東渡日本，轉向古文字、文物考證。民國十二年，受清帝詔命任南書房行走，負責整理宮中器物和典籍。民國十四年，應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教授。民國十六年六月二日，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。著有《觀堂集林》、《人間詞話》、《宋元戲曲史》等。

⁵³ 王念孫(1744-1832)，字懷祖，學者稱石臞先生，江蘇高郵人。乾隆四十年(1775)進士，選庶吉士。乞假歸，潛心學術。後授工部主事，致力治河之道，年六十七，以永定河漲引咎辭官。著有《讀書雜誌》、《廣雅疏證》等。

⁵⁴ 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9年）。

四、您近年在清華大學和李學勤先生合作，有哪些項目？從李先生那邊是否學到什麼？您個人從事的項目有哪些？

以前我做帛書《易傳》釋文，請教過李先生。這些年主要是跟李先生做新出簡帛方面的研究，包括郭店楚簡、上海楚簡，我們都在一起做。因為我跟李先生兩人在同一個單位，做的東西比較接近。報項目的話，一般都是李先生起頭，我負責進行，一起合作。再來就是我跟李先生的學術觀點比較吻合，李先生強調二重證據法⁵⁵，講互證；而且李先生跟我們老師關係比較好，他們的學術見解比較接近，就是在研究古代東西時，觀點較傳統，較相信文獻。一般搞考古的人是不太相信文獻的。現在態度偏激者，是主張不要看文獻的。李先生比較相信文獻，利用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互證，用傳世文獻來解釋出土文獻。有些人包括我們，可能也有這個毛病，一看到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有不同的地方，馬上就把傳世文獻否認掉，但是李先生不會這樣子，他不輕易否認傳世文獻。我們就受到李先生這個觀點的影響。李先生這個觀點跟金老師相同，雖然金老師不做出土材料研究，但是傾向是差不多的。所以我們跟李先生合作，很自然地就接受這些東西。

再來是李先生為人平和，沒有權威的架子，哪怕是跟一個本科生講話，都用討論的語氣。他越是平等地跟我們討論問題，我們也就越信服他。所以這些年來我們敬重他，也不完全是因為他的輩分比較高，而是自覺地如此。包括研究生在內，李先生的研究生和我的研究生，大家都是一起的，沒有什麼不同，我們兩個人的研究生都在一起討論。另外，我們對新的東西，一般來說反應比較快，而且我們對於比較傳統的東西，相對來說也較重視。這兩點可能跟別人不太一樣。因為很多做新材料的人，往往對於傳世文獻，特別對經書是不太重視的，而我們是主張兩樣並重。像我自己的研究本來是做《周易》，《論語》、《荀子》、《詩經》我也做過，其他做得少一點。簡單來說，我覺得李先生不僅是個人修養對我們有影響，他的學術觀點對我們也有很大的影響。

我以前最早做的研究項目是「帛書《易傳》與和先秦秦漢學術史」，是我自己

⁵⁵ 二重證據法係由王國維提出，強調地上文獻與地下出土文物並重的研究方法。

完成的國家研究項目，跟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領導小組申請，他們是中宣部的一個機構。我做過很多個人項目，國家社科基金、教育部基金等，我都做過。但是從九十年代後期開始，集體項目做得多一些，比如李先生主持的夏商周斷代工程，李先生還點明要我負責文獻這一個組，但是說實話，我做得並不是很多。我們有很多想法，特別對《今本竹書紀年》比較肯定，這一點我們可能跟夏含夷的觀點比較接近，但是很多專家不太贊同我們的意見。（林：李先生好像也不太贊成？）李先生實際上主持這個計畫，對他自己的意見不會堅持到底。這個項目當初打算是給十二萬元，他們在裏面開會，我們就坐在外面等結果，會還沒有開完，李先生就出來了，看起來不太高興，原來一下子被砍掉七萬元，剩下五萬元。經費砍掉後，我們的工作相對就做得少，所以這個工作我也覺得對李先生不好意思，因為我做得比較少。

另外我還做了一些其他工作，比如說參加了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的工作。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的「易類」有四十本，第一到第四十冊是我們編的。當時掛名的是我們經部編輯委員，包括朱伯崑、張善文、我三個人⁵⁶。實際上朱先生沒有參與這個工作，因為需要他的名字才掛上去的，主要是由張善文和我兩個人在做。我們認為當時條件比較好，因為傅璇琮先生是國家古籍小組的秘書長，他要求各圖書館善本室主任把古籍的卡片全部帶到北京來，然後我們在人民大學對面的飯店開會，利用卡片把相關書籍挑選出來。挑出來以外，當時我們還有一個項目是做提要，就是做「中國古籍總目提要」。總目已經做了，但是還要做提要。後來這個提要做得不太成功，原因是善本部主任李致忠先生帶著我們這些人去北京圖書館裏看書，把書調出來後，要讓我們寫提要，結果發現條件並不理想。北京圖書館九點多上班，十點才把書調出來，十一點多就要收回去，一整天下來讀不到兩、三個小時。我們讀了幾星期後，覺得這樣不行，做不出來。所以提要還是要繼續做，沒有完成。

當時我們把書先挑出來，國家古籍整理小組學術委員會針對我們挑的書做討論，看挑得好不好，但是事實上根本討論不起來，因為這些專家熟悉的書都是一流的，二、三流的書他們都沒看過。所以《周易》的第一到四十冊，實際上是由我們挑出來，然後他們再去書庫調出來複印。（林：當時如果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編好了，根據那個再來寫《續修四庫全書提要》，可能會比較方便吧！）那裏面的帛書

⁵⁶ 張善文(1949-)，福建長樂人。師承《易》學名家黃壽祺教授，現任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、易學研究所所長。著有《象數與義理》、《易經初階》、《歷代易家與易學要籍》等。

《周易》經傳釋文也是我做的，照道理應該把照片也附上去，但是當時有些照片還沒有全部發表出來，沒有拿到，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只好發表釋文。現在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的第一篇就是我做的釋文⁵⁷，跟全書的體例不同，就是這麼造成的。傅璇琮先生當時為什麼找上我呢？因為他看到陳來先生寫文章引用到我的說法，對我感興趣，又看了我寫的《周易研究史》這本書。傅璇琮先生他當時講學術研究史，表揚了兩部書，一本是劉起鈇寫的《尚書學史》⁵⁸，另一本就是我們的《周易研究史》，所以他後來就邀我們去做《續修四庫全書》。（林：不過劉起鈇那本《尚書學史》問題好像不少？）那本書要處理的問題也挺多的，他那個是辨偽學史。（林：臺灣的程元敏先生現在正在寫一部新的《尚書學史》⁵⁹，就是覺得劉起鈇寫得還不夠好。）

後來郭店楚簡出來，我們就做郭店楚簡的研究。我跟李先生合作，在學校裏面做了一個項目，然後在《周易》方面也合作了一個教育部的項目。所以這幾年確實都一直跟李先生合作，在李先生的帶領下做研究，包括我們的研究生也都是如此。就跟你們差不多，我們也是一個團隊。

五、請問您未來的研究計畫如何？

我現在打算在最近一年，把《周易》新注做出來，這是第一個工作。當然第一個是《周易》的簡注，再一個包括楚簡，再來是帛書《易傳》，也要把它們做出來。因為現在很多人研究帛書，大的精神有，但是注都沒有做出來。（林：您是說馬王堆嗎？）對！因為注沒有出來之前都是不行的。這是出土材料方面我打算做的東西。

另外，我有個想法，想給《論語》做一個新注出來。我昨天下午在臺灣師範大

⁵⁷ 廖名春：〈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〉，《續修四庫全書·經部易類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第1冊。

⁵⁸ 劉起鈇（1917-），湖南安化人。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。著有《尚書學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年）、《尚書源流及傳本考》、《尚書校釋譯論》（與顧頡剛合著）、《古史續辨》、《顧頡剛先生學述》等。

⁵⁹ 程元敏（1931-），安徽嘉山人。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畢業，國家文學博士，專研《尚書》學、中國經學史。任教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，現已退休，專力著述。著有《王柏之詩經學》、《王柏之生平與學術》、《三經新義輯考彙評》、《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疏證》、《三國蜀經學》、《書序通考》、《詩序新考》等。

學演講，就是講《論語》。包括賴貴三教授、林安梧教授⁶⁰，我們在一起講。我有一些想法，覺得程樹德的《集釋》、楊伯峻的《譯注》是我們原來比較相信的兩本書⁶¹，但其中也有一些問題。楊伯峻《譯注》我在下鄉時一直讀它，但最近幾年發現了很多問題，所以想做一做新注。現在我感到不足的地方，是注意到日本有做得非常好的，所以我想先把那些書翻譯出來。陳來先生原來有一個想法，因為美國人最近寫一個《論語》的書，影響很大。（林：就是《論語辨》吧⁶²！）想要叫我去做一個回應。但是我覺得這種東西單獨寫一篇文章做回應並不能解決問題，應該做一個新注，才能從根本上來解決問題。所以我對《論語》有這方面的想法。

再來是想做《荀子》。因為我碩博士一直做的都是《荀子》。當然王先謙做的《荀子集解》是非常好的⁶³，但是後來的幾個新注做得不太好。（林：最近幾年有一個新注，叫《荀子新注》⁶⁴，臺灣有盜印本，但沒有寫作者，請問那是誰做的？）《荀子新注》應該是北京大學張岱年先生、樓宇烈先生他們做的⁶⁵。臺灣大學哲學系的佐藤將之先生準備召開一個荀子國際學術研討會⁶⁶，他要我把大陸的

⁶⁰ 賴貴三 (1962-)，臺灣屏東人。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，專研《易》學。現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。著有《焦循年譜新編》、《焦循離菰樓易學研究》等。林安梧 (1957-)，臺灣臺中人。臺灣大學哲學系博士。曾任教於清華大學、南華大學，現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。著有《王船山人性史哲學之研究》、《存有、意識與實踐——熊十力體用哲學之詮釋與重建》、《中國宗教與意識治療》、《臺灣文化治療：通識教育現象學引論》等。

⁶¹ 程樹德 (1877-1944)，字郁庭，福建福州人。清末進士，公費留日，學習法律，返國後任教於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等校。著有《中國法制史》、《論語集釋》等。楊伯峻 (1909-1992)，湖南長沙人。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，曾任教於北京大學、蘭州大學等校。著有《論語譯注》、《孟子譯注》、《春秋左傳注》、《春秋左傳詞典》、《列子集釋》等。

⁶² E. Bruce Brooks & A. Taeko Brooks, *The Original Analects: 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* (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97).

⁶³ [清]王先謙著，沈嘯寰、王星賢點校本：《荀子集解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8年）。

⁶⁴ 北大哲學系注釋：《荀子新注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1983年）。

⁶⁵ 張岱年 (1901-2004)，字季同，別名字同，河北獻縣人。北京師範大學畢業，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、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等職。著有《中國哲學發微》、《中國倫理思想研究》、《中國古典哲學概念範疇要論》、《文化與哲學》、《中國文化與文化論爭》等。樓宇烈 (1934-)，浙江嵊縣人。專研中國哲學史、中國佛教史，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。編著有《荀子新注》、《王弼集校釋》、《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》等。

⁶⁶ 佐藤將之 (1965-)，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哲學博士。現任臺灣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。專研先秦哲學、儒家哲學、政治哲學。著有 *The Confucian Quest for Order: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Xun Zi*（《荀子禮治思想之研究》）。

《荀子》研究寫一個綜述⁶⁷。我覺得這樣很好。因為我們原來研究《荀子》，臺灣的東西看了一些，不會看很多，基本上是大陸的東西。現在的觀念是國外的《荀子》研究我們都得講，如果他能夠幫我們提供這樣的資源，那我們以後研究《荀子》可能可以做得好一些。（林：對，日本研究不少，還有美國也有。）所以他們開這個會，需要這個文章。我知道這種文章不是很容易寫，綜述的文章是最難寫的，但這樣對我研究《荀子》的工作是有幫助的。所以我最近就想做這幾個東西。（林：臺灣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所所長李哲賢先生⁶⁸，就是在美國研究《荀子》的，前一陣子他在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中發表關於美國研究《荀子》的現況，我可以向他要一篇文章寄給您參考。）

如果要做就要做下去，只做一點不太好。像臺灣這邊有李滌生做的《荀子集釋》⁶⁹，做得也不是太好。另外，像梁啟雄做的《荀子束釋》也不是太好⁷⁰。楊樹達先生⁷¹、高亨先生序寫得很好，但是楊先生、高先生是梁啟超的學生，梁啟雄是梁啟超的堂弟，所以就講了一些客氣話，實際上沒有他們說得那麼好。（林：還有三民書局那個《荀子讀本》⁷²，大概也不太好。）我們大陸《荀子》研究做得很多，但是多半不是在正常情況下做的，大部分是在批孔，所以不是學術研究，做得也比較急。包括我們的老師金景芳先生，當時就被派到山東大學，也要他們去做這類工作。所以我們現在做這些工作，當然可以先做一部分出來，然後再徵求意見，不用太著急，讓東西做好一點。（林：這些都已經可以做到六十幾歲了。）我的想法很多，可是不知道做不做得得到就是了。

⁶⁷ 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、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合辦「荀子研究的回顧與開創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於2006年2月18、19日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舉行。廖教授發表文章題目為〈近二十五年大陸荀子研究評述〉。

⁶⁸ 李哲賢(1953-)，臺北人。美國亞歷桑那大學漢學系博士。曾任銘傳大學共同科副教授，現任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教授兼所長。專研美國漢學、中國思想史。著有：《荀子之核心思想——「禮義之統」及其現代意義》、*Chang Ping-lin(1869-1936): A Political Radical and Cultural Conservative* 等。

⁶⁹ 李滌生(1903-1994)，山東博山人。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，曾任國民大會第一屆代表，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創系主任、教授。著有《荀子集釋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79年）等。

⁷⁰ 梁啟雄：《荀子束釋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年臺1版）。

⁷¹ 楊樹達(1884-1956)，字遇夫，湖南長沙人。專研文字學、音韻學、文法學。曾任復旦大學教授。著有《漢書管窺》、《積微居金文說》、《詞詮》等。

⁷² 王忠林編譯：《新譯荀子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72年）。

六、您來臺灣已經很多次，請問您對於臺灣的學術環境有何看法？

我是從二〇〇二年開始來臺灣。二〇〇二年來了三次，第一次是師大的會，第二次是臺大的會，第三次是宋代經學的會⁷³。二〇〇三年有兩個會，距離很近，我先參加了臺大東亞文明中心的會，再出席東吳錢穆先生的會⁷⁴。二〇〇四年來一次，是輔仁大學開古籍的會⁷⁵。二〇〇五年就是現在來參加臺大的會⁷⁶。加起來總共六次。（林：這樣算不少了。）來臺灣的次數算是比較多了，所以朱伯崑先生就笑說：「十一月份開《周易》的會你就不要去去了。」

我覺得臺灣同行對我們真的是太好了，很讓我們感動，不是一個、兩個好，是大家都非常熱情，而且對於學術都比較認真。我們大陸做學術的人是很多，但我覺得大部分的人都不認真。跟不認真的人在一起，是沒辦法談問題的。我們現在開會，比如談《荀子》，常在標題加上什麼《荀子》與現代化，寫出來的文章沒有多大學術意義。臺灣這邊數量雖然沒有大陸多，但是按照百分比來推算，對學術認真的比例還是高一些，這一點我是很有體認的。

再來是臺灣這邊的學者，像林先生你們，我覺得有一個最大的特點，就是在文獻方面下的工夫比較多，這一點可能是我們大陸學界比較欠缺的。（林：但是大陸古籍所、文獻所不是很多嗎？有八十多個。）大陸在文獻方面還是以前的老先生們做得好，現在這些老先生已經一個一個過世了。

我們大陸的學界如果要做一個客觀評價的話，就是在四九年以前有很多很不錯的學者，但是這幫人現在基本上已經不行了，年齡算一算你就知道了。現在五十年

⁷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「儒道學術國際研討會」，2002年5月25-26日；臺灣大學「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2002年6月26-28日；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「宋代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2002年11月20-22日。

⁷⁴ 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「出土文獻研究方法」學術研討會，2003年10月；東吳大學「錢穆思想學術研討會」，2003年11月。

⁷⁵ 輔仁大學「2004年古籍學術研討會」，2004年6月11日。

⁷⁶ 「新出土文獻與先秦思想重構」國際學術研討會，臺灣大學哲學系、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、輔仁大學文學院、東吳大學哲學系主辦，2005年3月25-26日。

代、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畢業的這一幫人，大約也到了六十多歲，這些人大部分在學術上面也沒有什麼很好的成就。像李先生、裘先生可以算是鳳毛麟角，他們是在一種特殊機遇下造就出來的。因為文革時期他們做出土材料，那時大家都不幹活，只有他們在幹。這種機遇是很少的，一般是沒有的。一般人在大學的時候都沒有好好念書，後來又碰上文化大革命，大家都沒辦法做學問。所以他們讀書差不多是跟我們同時起步，幾乎都是八十年代才開始，沒有任何優勢可言。這些人比較起來，還不如臺灣同年齡的程度。大約從八十年代以來，像我們這樣五十多歲的一幫人，應該說做研究的比較多，跟臺灣的研究水平應該基本上是差不多的。

當然大陸也有優勢，大陸的優勢現在看起來是在新出土材料研究方面，因為我們占有地利之便，而且我們對新出土材料的研究在文革期間也始終沒有中斷過。（林：對！那時候像《考古》、《文物》這類刊物都還繼續出刊。）像甲骨文、金文，包括漢簡，這些東西日本人也在做，但是日本人沒有戰國文字的研究，他們沒有意識到戰國文字是很重要的東西。而李先生他們在以前就意識到了，也培養了一批人才，剛好他們博士一畢業，材料就冒了出來，所以這幾年間一下子就可以發展起來。（林：對！占了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。）日本人現在想要趕上就很困難，因為他們沒有培養出這方面的人才。（林：日本人研究古文字的學者像白川靜⁷⁷，都已經太老了。）我覺得日本研究甲骨文、金文都還是不錯的，漢簡也很好，不比我們差，但是戰國文字他們就不行了。所以這些方面我覺得比臺灣要來得好。

不過最近這幾年臺灣青年研究生進步很大。郭店簡的問題他們還弱一些，但是上海簡一出來，兩岸就利用互聯網進行討論，透過互聯網把地域的限制打破。這個材料一出來，兩岸學者都在討論。很多年輕學者進步很快，可以預計的是再過幾年，臺灣這方面的人才就會培養出來。像今天我演講結束，就有好幾位研究生跑來找我，拿了《出土簡帛叢考》要我簽名⁷⁸，他們都買了這本書，說明臺灣這邊的同學對大陸學術是比較敏感的，這就是互聯網起了作用。像林先生你們在六、七十年代想了解大陸的東西很難，不要說一天、兩天，就是用幾年也不一定了解，可是現

⁷⁷ 白川靜 (1910- 2006)，立命館大學法文學部漢文學科畢業，曾任立命館大學文學部教授、榮譽教授。著有《中國古代文化》、《中國古代民俗》、《孔子傳》、《詩經研究·通論篇》等，其著作後彙編為《白川靜著作集》（東京：平凡社，2002年）。

⁷⁸ 廖名春：《出土簡帛叢考》（武漢：湖北教育出版社，2004年）。

在大陸一出，過兩、三天臺灣這邊就可以知道了，縮短了很多時間。研究生間可以互相討論，聯繫非常密切，現在我已經有落後的感覺，看到大陸現在的研究生，我感到精力不如他們，也不如他們細心。

再來，我覺得你們這邊的學術制度是值得我們學習的。我們那邊開會，提交論文，隨便就弄出來了。不負責任，亂成一氣。你們這邊有評論，有討論，這樣可以形成自律，相對地使會議論文的質量提高。其實在大陸，我們也是一直想提倡這樣辦，但是這樣會有幾個困難，第一個是經費有問題，第二個是發表的人太多了。（林：臺灣主要是有一個好處，會出機票、住宿費、生活費，可是規定要寫出一篇文章來，有這個約束力，而且有邀特定的人。像我去大陸開了幾次《詩經》研討會，有數百人之多，什麼人都可以來參加，亂寫一通的人也不少。）當然也有好的，可是好的比較少，所以開會變得浪費時間，沒有產生什麼重大影響。所以這一點是大陸應該學習臺灣的。

我在大陸開會是不太講情面的，可是一個人也沒辦法，大家都這麼做，也管不了。我是喜歡批評人的，誰的文章沒道理我就直接講，我是不管他的，為什麼呢？我想如果能夠互相提醒還是有好處的，你有問題我告訴你，你信就信，不信就算了。大陸老是討論很空虛的東西，比如怎樣評價孔子，討論這種無用的問題，而不講具體的東西。總是對一個歷史人物，討論是進步的還是落後的，討論這些東西，跟學術沒有太大的關係。（林：臺灣這邊也常在講儒家為什麼不開出民主，這樣的問題有點無聊，好像日本人常在討論「儒教是宗教嗎？」這個也很無聊。因為宗教是很現代化的東西，所以拿來看儒家是不是符合宗教的成份，當然會有一些相同的地方。）我們在北京也經常有這種討論。比如講《周易》有沒有辯證法，像有人提出來說：「《周易》怎麼可能有辯證法？辯證法是黑格爾提出來的，沒有黑格爾怎麼會有辯證法？」我就反駁他：「我們講的是思維方法，不是講『辯證法』這個詞，這是兩回事。」（林：就像中國有沒有哲學這個問題老是在討論，有點無聊，因為多多少少都有點這個成份嘛！）對，他們老是在講這兩個詞。所以我寫文章一般題目比較小些，寫比較具體的東西，我不想寫很大的。當然有些人會說我們是只埋頭吃葡萄不開箱，但是我們覺得做這些東西是比較靠得住的。